

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 的几个问题

谢 忠 厚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敌后第一块抗日根据地，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①；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又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唯一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正式承认的边区政府。这块根据地，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各方面政策比较完备，有许多创造，不仅对敌斗争，而且建党、建军、建政、经济、文教和群众工作，都有丰富的经验。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些年来，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很大进展。本文拟就研究中有关宏观性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一 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双重目标

（一）建立抗日根据地双重目标的规定性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迅速壮大，此后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中国历史也改变了航向。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哈里森说：“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一场革命运动发展得如此神速。”^②围绕研究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在推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西方学者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论点。第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是查尔莫斯·约翰逊于1962年

①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主席团致晋察冀边区电》，1938年10月5日，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② 詹姆斯·哈里森：《从长征到掌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纽约凌莱格出版社，1972年版，第271页。

发表的《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群众的支持，是“利用了农民的民族主义”^①，甚至说，如果没有日本侵略带来的危机和由此引起的群众动员，中国共产党将遭到失败。他还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看作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附属物”，中国拒绝照搬俄国革命的公式，形成了“中国的民族共产主义”。^②这种所谓“农民民族主义”和“民族共产主义”的论点，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论战。马克·塞尔登于1971年发表《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一书。他通过研究陕甘宁根据地，提出了与约翰逊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农民阶级是通过社会经济改革而不是通过民族主义才发生革命转变的。他提出：“中国抗日战争的意义超出了民族独立。人民战争不仅是个作战方式问题，而且涉及生活方式……在战争条件下，中国人民不但从日本的统治下获得解放，而且在反对地主军阀压迫的斗争中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自觉地创造出一些新的社会形式。”^③他认为，陕甘宁边区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楷模，而且是第三世界革命的范例。塞尔登的分析非常精彩，但也有不足之处，即忽略了陕甘宁边区与其他根据地的若干不同点。片岗哲谷于1974年发表了《中国的抗战和革命》一书。他对于民族主义的论点和社会经济改革的论点持怀疑态度，而强调政治、军事控制的重要性。他提出，中国共产党把农民动员起来，“这同传统的农村自卫、地方主义、地方土匪、军阀主义并无区别，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在于把这些地方势力加以改造，自下而上用完全现代化的组织把它们联合在一起，成千上万分离的孤立的细胞（政治性的）单位结合成一种钢铁的结构，然后中国共产党以抗战为掩护，以统一战线相号召，进行全面革命，来巩固其所拥有的根据地。”^④由于片岗哲

①② 查尔莫斯·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英文版，第9页，第69页。

③ 转引自王淇《论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见《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④ 转引自范力沛《西方学者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见上引书，第97页。

谷忽视所谓“钢铁结构”的客观基础，他虽然用了很大精力思索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政策，但还是陷入了“抗战掩护”之类的迷雾。拉尔夫·撒克斯顿自1975年起发表《革命中的佃农：传统道德的韧性》等文。他认为，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所以取得支持，不是由于它给农民带来了什么东西，而是由于它使自己适合于农民提出的要求。他写道：“1949年10月1日是农民自发性向政权基本结构提出挑战的顶点。”^①撒克斯顿把中国革命的胜利说成是农民自发性的结果，这是不能成立的，在西方学者中也很少有苟同者。

我认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不仅是抗日问题，更不单纯是武装斗争问题，它还包括进行各项社会改革，从事新民主主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改造旧中国的复杂斗争和广泛内容。研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就是要搞清楚这块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基地的形成和壮大发展的过程和根据地内抗日民主建设的情况。仅把敌后抗日根据地当作“抗日的力量”来研究是很不够的，因为它同时又是“民主的力量”，即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雏形。

晋察冀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样，它的建立有着双重的目标：抗日与社会的改革。这是由中国抗日战争的两重性质所决定的。毛泽东早在1937年6月就曾指出：抗日战争“也是一个革命的运动，因为抗日斗争伴随着争取民主、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和经济建设的斗争。在中国，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②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预言：这场战争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和变旧中国为新中国。^③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以及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日益取得显著成效，到1941年5月，毛泽东明确认为：“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④晋察冀根据地领导人聂荣臻回忆说：“毛

^① 转引自范力沛《西方学者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前引书，第98页。

^② 达格芬·嘉图：《走向革命》中译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68年版，第425页，第743页。

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就曾考虑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问题。每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不只是拖住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问题，也是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进行广泛的实践，为下一步的革命进程，为日后建立新中国，打下多方面的基础，积累丰富的经验。”^①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无疑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起了指导作用。

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实践了毛泽东关于战时双重目标的战略思想。它在华北敌后一诞生，就公开宣言，它要“贯彻抗日与真正民主”^②。这就是说，它的历史任务是双重的，不是单一的。晋察冀边区在共产党领导下，一方面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抗击日军，摧毁伪政权和伪组织；另一方面及时地实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和建设，改造旧社会、建设新制度。这样，就使晋察冀边区成为未来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一个良好的“模型”。

（二）抗日与社会的改革是不可分离的

在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里，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抗日又是与农村的社会改革密不可分的。由于日军的进攻，大片国土沦陷，这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制度已经完全腐败。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过去长期在旧制度下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不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就不能广泛地动员他们真正投入抗日斗争。因此，必须创造一种和大多数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利益相符合的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没有这种社会制度的变革，不足以改善农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地位，获得农民强有力的支持，也就不可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除非发动农民群众的人力和物力，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只有迅速地实行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才能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79页。

^②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宣言》，1938年1月14日，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上），第289页。

得到农民的合作”。^①但是，这种社会的改革，还不是要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而是要有步骤地削弱它，以利于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并联合包括地主在内的一切抗日阶级、阶层共同抗战。这即是抗日民主建设实施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真谛。

晋察冀地区农民群众的生活，战前是相当贫苦的。据对晋察冀根据地中心区——北岳区28个县88个村的调查，贫农、雇农占农村总户数近一半，平均每户只有土地1亩至7亩多；地主、富农占农村总户数不到10%，平均每户占有土地56亩至97亩。雇农、贫农和中农户数比地主、富农多8倍，总计占有土地只比地主、富农多0.6倍，占有水地多0.2倍，骡马等主要耕畜也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一般占土地收获物的50—70%。不少地区还存在劳役地租的残余，农民要无报酬地替地主种地、打零工、碾米、垫圈、打炕、扫院子，服各种杂役。高利贷盘剥更厉害，一般年息1分7厘至3分、5分，有的月息即达4分、5分，甚至“驴打滚”计利。还有出门利（借钱出门即算1个月）、现扣利（借钱时先扣1个月利息）、嘴嘴利、臭虫利、月拨利、印子钱等苛重盘剥。穷人指地、指房作质向富人借钱，到期还不起，就被留地、留房。此外，农民在交纳田赋和附加税后，还要负担警捐、保卫团捐、防共捐、房捐、户口捐、船捐、驮捐、盐税、棉纱统税、面粉统税、牲畜税等30多种苛捐杂税。在冀西山区，连山上各种树木的叶子，贫苦农民都无权采来吃，因为这些山树属地主、富农所有。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别是冀中、冀西和冀东的产棉区，广大农村变成为帝国主义掠夺原料、销售商品的市场，日益殖民地半殖民地化。因此，要调动贫苦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就必须迅速地改变这种状况，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

农村的社会变革，首先是解放农民，这是坚持抗战的前提条

^① 埃德加·斯诺：《人民在我们一边》，纽约，伦敦·浩斯出版社，1944年英文版，第278页。

件。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建设，实质上也是在抗日战争中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广泛的社会改革，在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开展生产运动；在政治上，实行普遍的民选，建立代议制和“三三制”政权，使广大基本群众参政议政。因此，一方面避免“左”的错误，广泛团结了边区各个抗日阶级、阶层；另一方面避免右的错误，保证基本群众占优势，使广大农民第一次得到了民主权利和生活的改善，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大大高涨起来。这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创造出种种奇迹的根本原因。

（三）实现根据地双重目标的深远意义

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真正实现抗日与社会改革两个相互联结的目标，实为关系中国抗日战争前途和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口头上也号召民众参战，但他们拒绝实行农村的社会改革和民主民生政策，不肯真正广泛发动民众起来抗战，因此不能赢得中国最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的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和其它敌后抗日根据地，正确地解决了农村社会改革问题，因而同中国最大多数人——农民建立了最密切的联系，开掘了中国抗日战争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抗战中来华的美国新闻记者约翰·谢伟斯，当时曾敏锐地领悟到了这一点。他说：“普通人第一次被给予为之而战斗的东西。与日本人战斗，不仅仅因为他们外族侵略者，而且因为他们阻碍了这场革命。人民将继续和任何限制或者剥夺他们新近得到的东西的政府战斗。正如日军不能征服现在富于战斗精神的人民一样，国民党军队也只能是失败。共产党有了这样广泛的基础，所以谁也难以对它进行限制……在相对短的几年时间内，共产党在中国将成为一支突出的力量。”①合作抗战，是国

① 约瑟夫·W·埃赛雷克：《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约翰·S·谢伟斯的第二次大战电讯集》，纽约温塔基丛书，1975年英文版，第248-249页。

共两党的共同主张，它们的根本分歧在于要不要实行农村的社会改革。毛泽东1944年4月对此作了精辟而尖锐的论述。他说：“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动摇于两者之间，口称赞助农民，但不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路线。”^①抗日战争时期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迅速巩固、壮大，人们可以从这里寻找答案。

二 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分期

目前，学术界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分期，认识尚不一致。有人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发展的“三个阶段”的说法，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发展划分为3个时期：上升时期（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下降时期（1941年至1942年），再上升时期（1943年至1945年9月）。有人以军事斗争的发展为线索，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发展划分为5个时期：开辟时期（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巩固和发展时期（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艰苦奋斗时期（1941年至1942年），恢复时期（1943年1月至1944年5月），反攻时期（1944年5月至1945年9月）。我认为“三分法”实际上是对毛泽东“三阶段”说法的简单套用，这种划分不能深刻反映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历史发展的特征和它在抗日战争中的特殊作用；“五分法”虽然克服了“三分法”的缺点，但由于它以军事斗争为线索，忽略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78页。

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改革等方面的发展进程，因而提法既不全面又过于琐细。研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分期，应当遵循两条原则：第一，应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阶段”的一般框架，结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具体实际来研究；第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是单一的军事实体，它的建设具有抗日和社会改革双重目标，因此，研究根据地的历史分期，必须对它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进行全面的考察和分析。根据以上原则，我认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时期（1937年11月—1938年10月）。七七事变后，八路军挺进华北。1937年10月下旬，聂荣臻部进入五台山地区，着手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和展开敌后游击战争。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公开宣布成立，标志着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不久，开辟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则宣告了华北敌后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并成为当时华北敌后抗战的最主要的战略支点。1938年3月，开辟平西根据地。6月，宋时轮、邓华纵队挺进冀东，随之，冀东爆发人民抗日起义。到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和日军开始调集兵力进攻华北敌后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扩大到有72个县、12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拥有县城数十座，武装10万人以上，农、工、青、妇等抗日群众团体会员100万人，建立了抗日民主的新社会秩序，成为华北抗战的坚强堡垒。在抗战初期大片国土沦陷、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下，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民主大旗在华北敌后高高飘扬，这对全国人民的鼓舞，对日军后方的威胁和对正面战场的支持，均有重要意义。对此，1938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在给聂荣臻等的电报中作了极高的估价：“边区党所执行的坚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依靠全党全军的努力，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

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①日本华北方面军的一份报告中称：五台地区“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②因此，在武汉会战的同时，日军调集2万余人于9月24日开始围攻晋察冀边区腹地五台地区。这是日军重点“扫荡”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信号。

第二阶段，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全面建设时期（1938年10月—1940年12月）。武汉会战后，日本将进攻重点由正面战场移到敌后战场，正面战场逐步转向对峙。敌后战场的地位突出起来。这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入以巩固和建设为主的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一定的发展。晋察冀边区首次反敌围攻五台的战役胜利后，1939年1月中共北方分局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制定了巩固和建设边区根据地的方针和政策。从此，晋察冀根据地一方面胜利地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进攻，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活动，巩固和扩大边区根据地；一方面在根据地内进行有利于广大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和建设。冀中区军民于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粉碎日伪军连续五次“分区扫荡”，于1940年春粉碎日伪军“全面扫荡”。晋察冀区军民粉碎了日伪军1939年秋季大“扫荡”。国民党顽固势力张荫梧、白志沂、金宪章等部的“磨擦”进攻也分别被打退。冀热察区军民执行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方针，到1940年底，创建了冀热察区大块游击根据地。与此同时，边区党经过整顿，成为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群众性的党；边区部队经过整编和训练，作战能力和机动能力大大提高；边区政权经过自下而上的民主改选，特别是1940年民主大选运动和《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简称《双十纲领》）的颁布实施，建立健全了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基本群众在政治上占了优势，并初步实现了“三三制”，从而，

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②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巩固和发展了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边区还普遍开展群众性的减租减息、生产和合作运动，发展贸易和金融事业，使遭到战争破坏的边区财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日军的“经济封锁”阴谋未能得逞。到1940年底百团大战结束，边区根据地已发展壮大为晋察冀、冀中、冀热察三个战略区、15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有正规部队约11万人，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坚持全国抗战团结进步的一个有力支柱。中共中央对此给予很高评价：“晋察冀各方面的工作均有伟大的成绩，堪称华北党的模范。”^①中共中央还希望晋察冀边区民主选举运动和《双十纲领》，“成为全国首先是其他抗日根据地，在民主建设上宝贵的参考和借镜”。^②

第三阶段，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奋斗和恢复发展时期（1941年—1943年底）。在百团大战后，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军对敌后战场的进攻更加疯狂和残酷，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这个时期华北日伪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蚕食”政策，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为其“扫荡”重点之一。1941年秋，华北日军集中7万余兵力对北岳区^③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1942年5月1日起，集中5万日伪军对冀中区进行残酷“扫荡”和“清剿”，1942年9月，集中4万日伪军对冀东进行大“扫荡”。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杀光、抢光、烧光”政策，修建据点、碉堡和封锁沟、墙，制造“无人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损失，其巩固区缩小，大部变为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和敌占区，财政经济也遇到很大困难。为克服困难局面，1942年9月中共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召开边区党政军高干会议，制定了“到敌后之敌后去”，开展全面反“蚕食”斗争的方针和措施。会后，主力部队分散活动，组织武工队、支队深入敌占区；广

① 中共中央对晋察冀工作的指示，1939年9月27日，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上），第289页。

② 《新中华报》1940年11月10日社论：《晋察冀边区民主建设的新胜利》。

③ 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于1941年1月1日改称中共北岳区党委，自此晋察冀区改称北岳区，辖区未变。

泛开展地道战、地雷战、交通破袭战等群众性游击战争，并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在政权建设方面，边区调整了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开展党的整风运动，实行精兵简政，提高机关工作效率，全面贯彻《双十纲领》和各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在经济方面，实行统一累进税，奖励生产，繁荣贸易，活跃经济，加强对敌粮食、物资、市场的争夺战。1943年1月边区参议会召开，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根据地边缘地区正确地运用抗日两面政权政策，使游击区政权建设进展很快。1943年9月—12月，边区军民粉碎了日伪军对北岳区为时最长、最野蛮的“毁灭扫荡”，宣告了敌人的“蚕食”、“扫荡”政策彻底破产。至此，北岳区被敌“蚕食”的地区基本恢复，还新增5个联合县；冀中军民恢复和开辟3000多个抗日村政权，各种公开的和隐蔽的抗日根据地在广大地区恢复发展起来；冀东根据地的平原基本区得到恢复，还新开辟8个联合县。这样，就打破了日军“以战养战”、“变华北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的计划，为准备反攻打下了基础。

第四阶段，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局部反攻、全面反攻和空前壮大时期（1944年初—1945年9月）。1944年春天，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战略反攻取得决定性胜利，在此形势下，日军为挽救其战略颓势，集中兵力向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的战役，敌后战场利用这一时机举行局部反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局部反攻于5月间向敌后迅速展开，猛烈地扩大解放区，同时，加紧做好全面大反攻的各项准备。由北岳区和冀中区开始的攻势作战，持续全年，取得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并组建了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等4个二级军区、区党委和区行署。1945年上半年，日本开始收缩中国战场的作战范围，将兵力从中国南方集中于华北和华中，企图进行“长期持久的防御战”，以作好“本土决

战”的准备。①中共敌后战场的春、夏季攻势作战使敌人计划受到打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于1月7日起发动一系列战役，席卷了雁北、察北、热河、辽西，直逼平、津、张市郊，并夺取了向东北进军的前进阵地，粉碎了日军对冀东的大“扫荡”，切断了日军向东北和朝鲜退却的咽喉要道。与此同时，全边区广泛开展彻底的减租减息运动、大生产运动、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运动和大练兵运动，为大反攻作准备。1945年8月初，在盟军会攻日本本土，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之际，10日起中共敌后战场举行全面大反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部队直指太原、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24日后，改为着重夺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同时抽调一部主力部队和大批干部挺进东北，收复失地。在1个月的大反攻中，边区军民解放了热、察两省广大国土，为收复东北，建立东北解放区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国民党政府阻止日伪军向人民军队投降，9月9日日本代表在南京签字投降后，敌后战场的战斗并未结束，一直延续到11月底甚至更晚些时候，战斗才真正结束。

在晋察冀边区的上述发展过程中，边区内几个战略区发展却不平衡。1940年前，冀中区和北岳区各项政策的执行大体是一致的，而冀东区、平北区还在开辟中。1942年敌人大“扫荡”后，边区各项政策主要在北岳区执行，直到1944年，冀中区和冀东区、平北区才与北岳区趋于平衡，而冀东、平北在减租减息和税收政策上仍有很大的灵活性。1944年，冀晋、冀察、冀中三区开始了攻势作战，而冀热辽区直到1945年上半年还在进行反敌大“扫荡”的斗争。注意到这些差别，有利于晋察冀根据地史研究的深入。

三 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4页。

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抗战的堡垒”之一，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不仅提供了在敌后山岳地带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先例，而且提供了在敌后平原地带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先例，标志着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后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策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它的创立和发展，打开了华北抗战的新局面，对于敌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后抗日战场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给全国人民指明了坚持持久抗战的正确道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联系华北其他根据地的枢纽。它牵制、抗击和消灭了日本法西斯的大量兵力，对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八年抗战，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经常牵制和抗击着 $1/3$ 到 $1/2$ 的华北日军和 $1/2$ 以上的华北伪治安军及部分伪蒙军、伪满军、关东军，共作战32000多次，粉碎敌人千人以上、10万人以下的大“扫荡”110多次，消灭日伪军35.1万多人。这些战斗直接威胁敌人后方的平汉、同蒲、津浦、正太、北宁、平绥等铁路和北平、天津等中心城市及关内外的咽喉通道，并在军事战略上与晋绥、晋冀豫、冀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及东北抗日联军相互支持，形成对日伪军的犬牙交错的包围形势，使敌深陷于人民游击战争的泥潭。这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也使日本法西斯无法抽兵北攻苏联，并推迟南攻美英的时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还是对日反攻的“前进阵地”，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收复东北失地和建立巩固的东北解放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晋察冀分局很早就注意开展平、津、唐等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1942年8月，晋察冀分局又成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以后在冀中、冀东、平北等战略区和一些重点县相继成立了同样的组织，培训了大批优秀干部，把他们派往东北各地，侦察敌情，建

立地下交通，组织抗日力量，为反攻和进军东北作了重要的准备。在大反攻中，晋察冀边区部队向日军在华北的巢穴进攻，收复了张家口、宣化、山海关等70余座城市，解放了河北省的大部、绥远省东部、辽宁省西部和察哈尔、热河的全境。晋察冀边区还调派一部分主力部队和数千名干部进军东北，与苏军会师，会同山东等根据地部队，解放了东北广大的国土，为建立巩固的东北解放区打下了基础，加速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进程。八年抗战中，晋察冀根据地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建立健全了主力兵团、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紧密配合作战的人民战争的军事作战体系。边区八路军在战斗中由2000余人发展到32万余人^①，民兵发展到90余万人。边区军民解放国土30余万平方公里（不含东北），使边区根据地由初期的43个不完整的县，扩大为拥有164个县、27个旗、4个自治区和近4000万人口包括河北省的大部，察哈尔、热河两省全部和山西、绥远、辽宁省一部的广大地区，与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和东北解放区连成一片。^②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世界各国反法西斯侵略的和平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表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八年抗战中，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伤亡11.6万余人，干部群众被残害致死70余万人，被敌抓壮丁50.5万余人，粮食被抢掠133.22亿余公斤，房屋被毁256.6万余间，牛马骡驴损失63万余头，猪牛损失370万余只，敌抓伏要工3.6亿余个，敌修碉堡、公路、沟墙占地889.2万余亩。^③在残酷的斗争中，晋察冀边区军民表现出的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为敌后各抗日根据

① 包括边区主力部队21.5万人，地方部队10.4万余人。

② 此系1945年11月晋察冀边区所辖区域和人口。

③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抗战八年来边区人民损失初步统计》，载1946年2月6日《晋察冀日报》。

地提供了丰富经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统一战线实验区”和“先导者”^①，推进了敌后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它模范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各项政策，在华北敌后最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即边区行政委员会，并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的正式批准，从而，提供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形式的典型和经验。在边区历次民主选举运动中，按照党的“三三制”政策，逐步调整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成员，使边区内的国民党、各少数民族及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有更多的参政机会，巩固和扩大了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建立起就非常重视财政经济建设，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经济斗争。边区政府实施了正确的经济建设的方针：顽抗暴敌，克服天灾，保证军需，充裕民生，增进农业，发展手工业、小商业、合作社，力求自给自足，活跃边区经济。晋察冀根据地在敌后最早建立了边区银行，发行“边币”，最早实行了统收统支和救国公粮制度，而且实行了“合理负担”和比较完备的统一战线的税收政策——“统一累进税”，卓有成效地保证了游击战争中的战勤供给。边区还采取了奖励生产和技术发明、活跃贸易和金融等一系列恢复繁荣经济的有效措施，从而使边区财政经济即使在遇到敌人严重破坏的最艰苦时期仍具有持久的耐力。同时，边区有效地开展了对敌货币斗争、粮食斗争和市场、物资的争夺战，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使日本侵略者掠夺华北、“以战养战”和变华北为“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计划遭到沉重的打击。在总结边区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之后，1940年，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制定了《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新中华报》指出：这一纲领，是“目前全国模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

^① 聂荣臻：《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39年1月，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上），第228—229页。

的施政纲领。全国各地，特别是敌后方其他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设施计划上，都应以它为最好的参考和借镜”。^①

（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制度实施较早的地区，各方面政策比较齐备，成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一个良好的“模型”。在抗战中，晋察冀边区不仅建立了敌后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而且经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民主改造，特别是村、区、县和边区的民主选举运动，彻底摧毁了旧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机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健全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一整套民主制度。边区还实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文化政策，逐渐削弱了农村的封建、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和宗法关系。晋察冀根据地通过各方面的抗日民主建设，把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模型”具体地呈现出来，使全中国人民看到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光明前景，这对于促进全国政治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① 《新中华报》1940年10月3日社论：《中共晋察冀边委的施政纲领》。